

中国道路、思潮论争和单线式历史思维的超越

梁 孝

摘要: 中国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多样化思潮对中国道路进行不同的解读,造成思想混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体系中,一直存在一种单线式历史思维。这种历史思维衍生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诸多悖论,并形成否定性结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史观,以及作为具体表现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历史思维的产物。只有超越单线式历史思维,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中国道路; 多样化思潮; 单线式历史思维; 现代化史观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5)04—0037—06

不管是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还是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整合,都必须有坚实的历史观支撑。在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体系中,一直存在一种单线式历史思维,这种思维衍生出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否定性结论。中国思想领域多样化思潮激烈争鸣,就思想原因来说,这种单线式历史思维是一个重要因素。澄清、突破这种历史思维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思潮论争中的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巨大成就引起国外学者极大关注。是否存在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否存在普遍性,中国道路的未来将会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成为外国学者讨论的热点。这些问题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西方对自身衰落的焦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走的是一条谨慎的、渐进的改革之路,在政府控制下逐渐引入市场机制,逐渐有序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苏联则与此截然相反。苏联在经济改革受阻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移植西方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迅速实施“休克疗法”,彻底实行私有

化、市场化改革。当时一些俄罗斯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苏联(俄罗斯)的改革是一步到位,由于它迅速移植西方“民主+市场”的社会模式,俄罗斯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很快就会起飞。而中国则是把关键的问题拖到最后,这能减缓改革之初的阻力,但却把问题积累下来。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俄罗斯改革的麻烦在开始,中国改革的麻烦在最后。而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不过,历史的发展完全出乎这些学者的意料。

俄罗斯并没有因为照搬西方模式迅速起飞,而是问题重重。中国则是根据国情和自己面临的实际问题,既继承传统体制的优势,又学习西方的经验,不断发展。“中国崩溃论”逐渐被“中国威胁论”所代替。

西方学者的思想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之初,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复制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走西方的路。而现在则开始承认,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中国的成就正在于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政治经济制度。

不过,就在国外一些学者思想发生转变的时候,我国国内思想领域、社会领域,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却出现多样化思潮。这些思潮激荡争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定位改革开放,解读中

作者简介: 梁孝,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国道路,并以此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案。

这些思潮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思潮、公民社会思潮、普世价值思潮、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宪政思潮、公民社会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可以统称为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人间正道。俄国、中国等本身就落后的封建国家应该走上这条道路,但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影响,这些国家脱离了正确的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了畸形的社会模式。中国的未来就在于回归“人间正道”。新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领域,要求彻底地私有化、市场化、资本运行自由化和国家最小化。宪政思潮是一种国家制度和一揽子方案,实际上就是要移植西方的政体,主要是多党制和分权制衡。公民社会思潮则是从社会交往层面出发,来论证中国必须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思潮的内容则是价值观领域,就其总体倾向而言,它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以“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内容,强调个人自由、自主,把西方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视为符合人性的最完美的制度。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人间正道,世界的西方化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应该走上这条道路。总之,自由主义思潮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极权的,是一种变形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的改革方向就应全盘西化。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逐渐采用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结果,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太慢,不彻底。

可以说,这也是早期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弱化为改良运动。它主张利用西方的民主制度,通过议会斗争,合法地取得政权,从而和平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它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调节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内部矛盾。北欧的瑞典模式被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一种思潮而言,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而在于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这种思潮往往把北欧的瑞典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较,并根据人民的福利制度和生活水平等标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①这一思潮的逻辑推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以此为基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实质上否定了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

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但二者很容易对接。一旦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就很容易由此转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也称之为老左派思潮。这一思潮的初衷是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关注社会民生,尤其是关注工农的利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居,经常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本本出发,以一种‘唯我独马’的心态,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的现实”^②。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把苏联模式视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则是背离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当今社会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因此,这一思潮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回归苏联模式,回归前30年。

这些思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共和国前30年和后30年分裂,评价截然相反,非此即彼,或者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或者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否定现在的中国道路。

“补课论”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它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错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代表人类未来,中国要走美国的路,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样,西方的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应成为中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认为要“补课”,而且正在补课,但是力度不够。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则否定“补课”,但也认为改革开放是在“补课”。大多数西方学者最初看待中国改革的观点也是“补课论”。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单线式历史思维

历史观能给一个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提供合法性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但是,在中国长期的思想教育中,对唯物史观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并且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单线式历史思维。

① 谢涛《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② 吴新文《当代中国三大思潮反思》,《社会观察》2014年第3期。

在中国思想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简化为这样一种“常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and 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必然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代替,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1956年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国思想教育中这些系统化内容脱胎于苏联教科书体系,它是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论证的,并为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文化领导权服务。它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苏联当时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不自觉地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思维,把一个国家放在五种社会形态中确定其历史方位,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而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单线式发展过程。但是,这种单线式的历史五阶段论与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诸多悖论,出现一些“难题”,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工作。这些难题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按照历史的进程,社会主义应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在《致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信》中探讨俄国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但是,与理论预期正相反,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个跨越是如何发生的?是否能够跨越?这是中国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

第二,关于“两个绝不会”问题。马克思有个著名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社会主义公

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这一内在矛盾的扬弃,但它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可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如何契合?这与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的论断完全矛盾,与理论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完全矛盾。

第三,富裕的资本主义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差距问题。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经济和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说当时的中国,就是较发达的苏联东欧,也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解释这一理论和现实的悖论?

人们很容易从这三类问题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俄国、中国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按照历史进程,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切实际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历史规律。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早产的”“畸形的”,它实际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回到历史原点,根据生产力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彻底放弃计划经济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这也就是常说的“补课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经济的“课”,“普世价值”思潮、“宪政”思潮、“公民社会”思潮是“补”政治的“课”。“民主社会主义”也认为中国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改革开放是“补课”,只是对之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从历史观来说,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史观在中国强劲兴起,通过当时的“新启蒙”运动,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现代化论者“都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持乐观态度;都对现代科学和技术能够将所有国家转化成为相互联系的、具有类似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实体充满信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像所有其他非社会主义一样,中国迟早会变成现代化国家,并且中国正在进行的从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与所有的现代化的经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②。现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声、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0页。

化史观假设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传统国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都会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准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换句话说,每一个传统国家都能发展成为发达的现代国家,它们必须走西方的路。

现代化史观是一种更加学术化的“补课论”。按照现代化史观的逻辑推论,美国是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因此,美国制度自然成为中国学习的范型。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经济现代化,“普世价值”思潮、“宪政”思潮、“公民社会”思潮是政治、社会现代化。“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中国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很容易转化为现代化理论。但是,在现代化史观中,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的历史被否定,更进一步说,中国的革命史也被否定。因为,从现代化史观来看,西方的扩张,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观念传播的过程,中国的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是拒绝了这种传播,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改革则是重新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这样,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到改革开放,中国道路就被相互割裂。这也是我国思潮激荡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还要看到,现代化史观本质上也是一种单线式历史思维,它认为每一个国家都能发展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实际上,这种单线式历史思维就隐藏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体系中。在我国,人们习惯于以一个民族国家为单位思考历史发展的进程,或者说,一个国家(一般来说)要依次经历五种不同社会形态。这就意味着,每个封建社会(传统国家)都能发展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只不过,现代化史观把关注点聚焦在这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上。由于单线式历史思维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二者间存在的悖论,人们自然转向“补课论”,接受现代化史观。甚至可以说,现代化史观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单线式历史思维的衍生物。

因此,如果不能反思、突破单线式历史思维,就不能真正批判现代化史观,也就不能真正澄清和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三、超越单线式历史思维的三个视野

现代化史观以及多样化思潮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是否搞早了,走错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突破单线式历史观,引入三个视野。

第一,超越以单一民族国家为思考单位的思维定式,重新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野。

资本主义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全球分工体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它的核心目标是资本积累。这个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中心区,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实际上是边缘区。中心区与边缘区是有内在联系的。中心区的发达是以边缘区的贫穷为前提的。中心区通过技术垄断、金融霸权、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剥削压迫边缘区。换一种通俗说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两极结构意味着,只有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起来,基本上是幻想。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两极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因此,‘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道路。”^①

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从1830年起,荷兰在荷属印度(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实行强迫种植制度。国家是生产者,殖民地政府强迫当地居民用一部分土地种植政府指定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在国际市场有巨大需求,如甘蔗、咖啡。这些农产品运到荷兰出售,出售所得用以补充荷兰国库。从1831~1837年,数额达到8.23亿荷兰盾,相当于荷兰全国开支的1/4。这些钱被用来偿还债务、建设公路和铁路。与此同时,这项制度造成荷属印度的贫困。参与世界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转移,而传统农业受到冲击,被边缘化^②。因此,如果把荷兰资本主义扩张简单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扩张,并认为其殖民地也会重复荷兰资本主义的过程,则是错误的。

不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时都具有国际视野,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③列宁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具有一种“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个“中心—边缘”的两极结构。但是,在1924年到1926年间,就关于如何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问

① 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② 参见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夏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579页。

题 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大论战。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领导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国际分工之上的,作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建成。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领导人认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迹象,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大辩论。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领导人取得胜利而告终。托洛茨基的观点有其错误,也有其合理成分,尤其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分工体系。但是,由于后来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在大辩论之后,关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观点被放弃,从单一民族国家来思考历史进程成为一种思维定式,甚至是无意识。

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依次经历五个社会形态,就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现代化史观也是错误的。纵观20世纪历史,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只能是少数国家。但是,在单线式历史思维中,这个错误却被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下来。

第二,区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流,确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变化。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症结就是忽视这一制度所承担的功能的变化。

20世纪初前后,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运动的中心不断东移。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英国和法国转向德国,又从德国转向俄国^①。

这个现象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有内在联系,并由它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流,以及后来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变化。

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资本主义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缓解危机造成的国内矛盾,对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走向资本垄断,在政治上则给工人以选举权,在社会方面开始实施一些福利制度,在文化上则宣传民族主义。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英国外)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扩大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这就形成了“宗主国—殖民地”为形式的地缘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弱化,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新的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国家

则阶级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俄国和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弱化和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对外剥削压迫来缓解内部矛盾有着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东移的重要原因。不能把二者割裂。

如果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兴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开始弱化为一种改良运动。而发生在俄国、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质上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也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但它的历史任务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集中资源完成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苏联领导人也确实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设想超越现实,根本无法实施。随后,为了恢复生产和国内秩序,列宁施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发展。1927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并最终形成现在所说的苏联模式。这种巨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被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必须快速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大工业。但是,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而且经历了残酷的内战,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这就造成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国有企业规模有限,积累不足,苏联不可能仅仅凭借国有企业推行快速工业化。因此,它必须把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剩余,尤其是农业剩余收集起来,投入工业化,推动工业快速发展。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粮食被富农所控制,他们拒绝高价工业品,国家无法收购粮食。或者说,小农不需要现代大工业,但发展现代大工业却不能离开小农生产的粮食。粮食收购危机随之爆发。一方面,工业人口缺乏粮食,国家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

^① 参见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品交换出现断裂,经济面临崩溃,更不要说快速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这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农村集体化,都是为了最大限度集中国内有限资源,通过国家统一计划,快速(甚至超高速)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但是,在苏联以及我国的思想教育体系中,没有严格区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的区别,这造成了评价标准的混乱。对于苏联模式的评价,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其是否有助于完成超高速工业化。人们往往以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来衡量苏联模式,自然就会出现否定性评价。

第三,必须从国家安全、工业化和制度变迁三位一体的视野来理解中国道路。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只有英美之类少数中心国家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多数国家成为附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科学、技术、资金和某些制度是中国必须学习、吸收和借鉴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侵略性,想通过经济、政治、金融和军事等手段加强霸权,把中国置于其附庸地位。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模范移植西方的制度,中国必须走一条新路。

为了发展,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必须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而工业革命之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发展水平的较量,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致力于赶超型的快速工业化,而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这要求中国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这是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这个体制的历史功能就是在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

新中国制度发展有两大重要转折点,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迅速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渐摆脱苏联模式。而这些制度变迁都与解决工业化所面临问题有根本联系。

把中国建成现代工业国是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对百年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的血的教训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苏联援助力度不大,中国主要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因素。这时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但是,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空前提高,苏联的援助迅速加大,形成“工业156项”,中国有了全面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可

能性。随后,中国迅速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理想、领导人的作用,但更深层的还是快速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比如,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毛泽东也看到了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甚至提出要保留一部分民营企业,刺激国有企业。1956年,毛泽东在同工商商业界人士的谈话中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求,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①但是,公私合营速度之快超出最高领导人的预料。

这里面有深层历史原因。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156项”及其配套项目全面展开。但是,中国像苏联一样,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原因是私人粮商和国家争夺粮食份额。这威胁到国民经济稳定、工业人口粮食供应以及粮食出口换取设备。最后不得已,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而当时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重要原材料被国家控制,这些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统购统销意味着取消市场,在交换领域实行计划经济。交换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生产领域。后来的公私合营,只不过是计划经济进一步进入生产领域,所有权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这都是与统购统销、粮食收购和大规模工业化相联系的。

计划经济这一制度模式历史使命的完成、本身的弊端不断凸显、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工业化继续推进的要求,这些因素影响着改革开放后30年的制度变迁历史。只有从国家安全、工业化和制度变迁三位一体这个视野出发,才能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区分制度成本和具体的政策失误,才能正确地改革开放进行历史定位,未来勾勒正确的蓝图。

总之,只有超越单线式历史思维,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性特征,认识到边缘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功能的变化,理解工业化与中国制度的变迁的内在逻辑,才能找到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脉络。由单线式历史思维衍生的各种悖论以及相应的思潮论争也就失去了它们的逻辑支点。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3页。